

论民国滑稽诗话的特征及其诗学意义

李飞跃 曹辛华

〔摘要〕 民国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滑稽诗话,目前却缺少全面的专门的研究。这就需要我们从事各方面进行透视,以促进民国旧体文学、诗词学、诗话学研究的深入。民国滑稽诗话不仅名称杂多、形态多样、载体不一,而且各阶段刊发情形不同,呈现出繁盛芜杂姿态;其编者、作者的身份素养、创作心态各不相同,表现出与前代诗话作者迥然不同的特点。另外,滑稽诗话不仅诗料来源多样,编排体式不一,行文语言、打造艺术与文风独具特色,而且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有休闲解颐、警世觉民、增长读者知识之功能。研究滑稽诗话不仅有利于考察当时通俗文学的发展生态、探究新旧文学的冲突与调和,而且有利于从诗学观念、诗学理论和诗学批评的角度,构建滑稽诗学史、滑稽诗史。

〔关键词〕 滑稽诗话;特征;诗学意义

诗话作为中国文学批评特别是诗学批评的重要形式,一直为人们所运用与创作。特别是至近现代,诗话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但由于学界对民国时期旧体文学领域的偏见,最近十多年才有学者大幅度地开拓与研究。曹辛华教授在对“全民诗话”^①进行系统整理的过程中,已考索出诗话多达7000余种(含联话、诗钟话、论诗韵文等)。其中“滑稽类”诗话达300种以上,并大多刊登于民国报刊上,其刊载期数超过700期,涉及报刊140余种、作者近300人。此类诗话不仅数量多,而且极富文学趣味,在中国诗话发展史、中国通俗文学史和诗学批评史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目前尚无全面的专题研究。鉴于此,我们将在研究滑稽诗话刊登、主体、编写与题材等方面特征的基础上,揭示其于通俗文艺、新旧文学、滑稽诗学及诗史等方面的意义,以促进民国旧体文学、诗词学研究的深入。

一、刊登特征

民国出现的滑稽诗话不仅名称杂多、形态多样、载体不一,而且各个阶段刊发情形不同,呈现出繁盛芜杂姿态。其一,名称杂多、形态多样。当时出现了大量以滑稽、幽默、游戏、荒唐、解颐、打油、谐、趣等字眼命名的诗话。其中滑稽诗话最多,约190种。如尤爱梅《滑稽诗话》、半迂《胡卢室滑稽

李飞跃,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上海200444);曹辛华,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4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民国词集编年叙录与提要”(13&ZD11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民国话体文学批评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6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民国诗话词话整理与研究”(15AZD046)的研究成果。

^①参见曹辛华:《论全民诗话的编纂及其意义》,《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3期。

诗话》、吕伯攸《桃李盒滑稽诗话》、天恨生《轶庐滑稽诗话》等等。幽默诗话和诙谐诗话各约 22 种,如百花主人《幽默诗话》、断霞《谐诗话》、晓渡《迎翠轩谐诗话》等。打油诗话如金梁桥《打油诗话》、蓝踪萍《谈打油诗》等,约 15 种。其他还有闻见、枫隐等人的游戏诗话 11 种、解颐诗话 8 种、趣诗话 5 种、荒唐诗话 2 种。不仅如此,当时还有不少诗话内容主体为滑稽,但并不以专门字眼标明者,需要我们细读内容才能判定。如韦父《嘻嘻哈哈室诗话》、随缘乐《自求多福斋诗话》、蕉心《养欢喜斋诗话》、糊里糊涂居士《戏女诗话》、霏霏《傀儡诗话》、王冰史《破涕为笑斋诗话》、野鹤《销魂诗话》、潘大年《捧腹诗话》、姚民哀《也是诗话》、王粲《索笑檐诗话》、佚名《丐者之诗》、徐枕亚《快活三郎诗话》等。而《胡卢阁诗话》最为独特,此诗话由双热、澄醒、孤雁、枕亚等 20 名作者编创,1914 年连载于《五铜圆》。另外,还有一类夹杂于其他综合诗话中的滑稽诗话,由于其驳杂,其数量很难探知。如赵元礼《藏斋诗话》辑录滑稽类诗话 8 则,既录有早年相传之谐诗,又录有其他诗话所载之趣诗;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录滑稽诗话 6 则^①;海纳川《冷禅室诗话》亦收录滑稽诗话数则。总之,滑稽诗话不管以哪种形态存在,其中心均以“滑稽”为主。当我们考察滑稽诗话时,当以其内容为主,对那些隐含在各种诗话中的“滑稽”部分也应予以足够的关注。

其二,滑稽诗话的传播载体也相对复杂,见于民国各种大报、小报、杂志期刊的滑稽诗话情态多样。一方面,当时不少综合性大报纷纷开辟副刊和专栏刊登滑稽诗话。如《时报》不仅开辟副刊《滑稽时报》,还设置“滑稽余谈”“滑稽谈”专栏刊登滑稽诗话。《新闻报》也设置副刊《庄谐丛录》,开辟专栏“庄谐录”“谐林”等刊登滑稽诗话。其中有些大报如《益世报(天津)》《大公报(天津)》不仅设置“益智糗”“诗话”“谐著”等栏目,还专门有“滑稽诗话”栏目。这些综合性大报刊登滑稽诗话多达 70 种左右。而当时的小报也纷纷开辟专栏刊登滑稽诗话,其刊载数量超过百种,远超大报。如《劝业场》《大世界》《金刚钻》《新世界》《小说日报(1922—1923)》等相继开辟如“嚶求世界”“快活林”“隼语”“滑稽世界”等专栏刊登滑稽诗话。《先施乐园日报》更是开辟多个专栏如游戏场、俱乐部等刊登滑稽诗话。如载于其上的有觉尘《游戏诗话》、惜玉《滑稽诗话》等 18 种。另一方面,除各种报纸外,当时还有 70 余种杂志期刊刊登滑稽诗话达近百种。如《五铜圆》《民权素》《红杂志》《世界画报》《学生文艺丛刊》《大东亚》《天津商报画刊》等。更有一些专门以娱乐、消闲为主的期刊如《滑稽杂志》《游戏杂志》《消闲月刊》《游戏世界》《立言画刊》《快活世界》《最新滑稽杂志》《消闲钟》《庄谐杂志》等刊载滑稽诗话。不仅如此,其他一些行业报刊或机关报也不时刊发此类作品。如《吉祥医药》上刊有郑逸梅《滑稽诗话》,《交通部平津区铁路管理局公报》上刊有龙《解颐诗话》《南京日报》发表有女史《幽默诗话》等。再一方面,与报纸、期刊的载体相比较,民国时期不仅出现专门的滑稽诗话汇编,还在各种游戏、娱乐、通俗等个人著述以及诗学著作中收录滑稽诗话作品。目前见到的专门汇编滑稽诗话者,如曹绣君《喁喁诗话》(《游戏文学丛刊》,文明书局,1931 年)、蒋箸超《蔽庐非诗话》(民权出版社,1915 年)、保清《滑稽诗话》(中国图书公司和记印刷所,1917 年)、范左青《古今滑稽诗话》(会文堂新记书局,1922 年)、胡山源《幽默诗话》(世界书局,1937 年)等。而个人著作如李定夷《滑稽魂》(古今书室,1919 年)、李龙公《滑稽俱乐部》(竞智图书馆,1924 年)、李涵秋《沁香阁游戏文章》(震亚图书局,1927 年)、赵煦《新游戏文章》(会文堂新记书局,1928 年)、樊增祥《滑稽诗文集》(广益书局,1936 年)等均有“滑稽诗话”内容。

其三,滑稽诗话在民国不同时期刊发情况也存在着差异。民国初期(1912—1919)滑稽诗话共有 88 种。如史别抱《游戏诗话》、晓渡《迎翠轩谐诗话》、梅痴《滑稽诗话》、碧梧《谐诗话》、枫隐《滑稽诗话》等均连载于此期间。这时期的滑稽诗话基本以文言为主,绝大多数刊载于小报上,尤其集中于

^①如录湘潭王壬甫滑稽诗《自述诗》,录“误黄为王”的一则报载滑稽诗话等。

《先施乐园日报》《劝业场》《大世界》，这三种报纸所载滑稽诗话就达37种。而载于《益世报（天津）》《时报》等大报上的滑稽诗话有20余种。二十年代（1920—1929）滑稽诗话的数量比民初有所增加，总数达100种左右。不少大报继续刊登滑稽诗话，连载时间最长的是寒山《滑稽诗话》（发表于《益世报（北京）》），其时间从1918年持续到1926年，达36期。此时期刊登滑稽诗话的小型报刊增多到40余种。如《轰报》刊登有舒芍《滑稽诗话》《黄报》连载有吴郎《滑稽诗话》，其他还有《最小》《笑画》《月亮》《趣报》等民初未见的小报刊都刊登了滑稽诗话。到了三十年代（1930—1939），滑稽诗话从数量上呈减少趋势，总数约57种。但此时出现了幽默诗话，数量达14种。如刘曼云《幽默诗话》、芳踪《幽默诗话》等。而连载时间最长，发表期数最多的是思齐庐主连载于《大同报》的《幽默诗话》。其时间从1935年到1940年，达26期。幽默诗话的出现与30年代“幽默文学”观念的引入有关。进入四十年代（1940—1949），滑稽诗话数量继续呈现下降趋势，仅有40种滑稽诗话出现。这时期诗话虽已不多，但诗话作者对打油诗表现出了更多的兴趣，共有9种打油诗话。如蒋公健《我为油诗而谈》、油渣《我也谈打油诗》等。40年代的滑稽诗话多刊载于具有时代特色的新闻类报刊上，如《东亚晨报》刊登了梅花生的《滑稽诗话》《经世日报》刊登了介士的《滑稽诗话》，其他还有《南侨日报》《中华时报》《蒙疆新报》《中央日报》《绥闻晚报》《前线日报》等都刊有滑稽诗话。这时期，民初和20年代的小报已很少见。总体来看，1914—1929年间滑稽类诗话数量最多，占比约总量的三分之二，其中尤以1920年前后形成高潮。某种意义上这也体现了旧体诗由于受到白话运动的影响而寻求自我保存的努力，反映了潜藏着的深重文化焦虑的集中爆发。鉴于滑稽诗和诗话半文半白的浅俗特点，使得在白话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的背景下，作为传统文学批评形式的滑稽诗话依然受到欢迎。

二、主体特征

滑稽诗话编者、作者身份素养、创作心态各不相同，表现出与前代诗话作者迥然不同的特点。其一，前代人们囿于正统、典雅的文化或礼教，碍于文人身份，多不敢公开创作或编辑滑稽诗话。而至民国时期，编辑、创作滑稽诗话者的身份素养却有明显改观。就总体来考察，滑稽诗话的作者以编辑、报人为多。这些编辑、报人既有旧学根底，又能接受当时的新传媒及通俗文艺方式。他们基本上都经历过传统旧学、诗学的泽被到新思潮、新观念的熏染这一过程，属于新旧兼具的现代小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处于新旧变革的朝代，能迅速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在扭转文人不“以文为戏”传统、接纳西方“滑稽”“幽默”等文学观念方面领先一步。如郑逸梅不仅有旧学底蕴，又具备快速接受新事物的意识。在中学读书期间，就把英文课文翻译成中文投稿。他曾主编《游戏新报》《消闲月刊》《金钢钻》等，这些刊物都刊登了不少的滑稽诗话。他本人也创作有《销魂诗话》《游戏诗话》《谐诗话》等。周瘦鹃亦如此，曾入私塾、学习诗集经传，同时他关注西方文化，编译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等。周氏不囿于传统观念，对通俗娱乐文学情有独钟。他曾任《自由谈》主编12年之久，先后创办、主编或与人合编《游戏世界》《礼拜六》《上海画报》《紫罗兰》《红杂志》等多种报刊，上面刊载了至少20种以上的滑稽诗话。如粉蝶、剑盒等《滑稽诗话》刊登于《自由谈》、高天楼《滑稽诗话》刊登于《红杂志》、雁飞《滑稽诗话》刊登于《游戏世界》等。除了主编的报刊上刊登滑稽诗话，周瘦鹃自己亦创作《游戏诗话》。像这样的文人还有很多，如芙影室主陈寥士早有诗名，著有《单云阁诗》。后受到新思想的影响，积极投身五四运动。他不仅撰有《单云阁诗话》，还撰有《胡卢阁诗话·五铜圆歌》《芙影室滑稽诗话》《滑稽诗话》等多种。

其二，滑稽诗话作者创作心态各不相同。归结起来约有两类。一类是“欲开还闭”式的遮掩。前代诗话作者身份明确，创作态度严谨，其创作目的只是为了记录诗坛逸事、阐明诗学理论等，不屑于

创作滑稽诗话之类的作品。此种情形在民国时期仍旧存在。有的认为所作香艳、粗俗、狭邪等娱乐文学难登大雅之堂,担心累其声名,虽然创作此类东西却遮遮掩掩。不少滑稽诗话作者在署名时多用笔名或别署,而非真实姓名。如1918年9月8日《先施乐园日报》刊登的《谐诗话》署名为蠹鱼,《捧腹斋诗话》署名为汝痴,还有《滑稽诗话》署名为百花主人、笑云、大等,《幽默诗话》署名为玉郎、女史等,像这样的署名还有很多,如岩岩、吟花、庆、三、蔚、常、丈、星等等。甚至1918年期间《大公报(天津版)》刊载的《滑稽诗话》连署名也没有。其缘由除作者不在意是否署真实姓名外,还当有避忌的成分。与此类相反,还有一些滑稽诗话作者或编辑则能坦然面对、正视之。这些作者有的因为时世变动,经济困顿,为了生存进入通俗娱乐业。如周瘦鹃、郑逸梅等均父亲早故,家境贫困,而姚民哀则由于家道中落而辍学。有的则纯粹因为其行业收入可观而进入该行业。如程瞻庐辞去教师一职,专业卖文为生。包天笑更是觉得在上海卖文“比了在人家做一教书先生,自由而写意得多了”^①。为了有更多收入,他们不仅从事创作,同时还做报人、编辑。这样除稿费外,他们还可以获得另一份固定的编辑收入。如李定夷创办《消闲钟》《小说新报》,兼任主编;姚民哀与戚牧等共同编辑《新世界报》。其他郑逸梅、徐枕亚等均创办主编过不止一种报刊杂志。而当时的编辑收入,“每月多则三四百元,至少也要拿五六十元的薪俸”^②。也正因此,为了扩大所主编刊物的可读性与吸引读者,滑稽诗话等娱乐内容就成为他们的首选。与其他“羞于”署名的情况不同,他们专门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以此扩大自己和创办、主编报刊的影响力。有些作者不仅直书大名,还关注滑稽诗话理论,为滑稽诗话正名。如蒋箸超将歪诗当做堪破世情之作,对滑稽诗的创作原则进行了重新解释,来为滑稽诗话正名。甚至他还在《小说日报(1922—1923)》上做广告来为自己以及《蔽庐非诗话》进行宣传。而张恨水《滑稽诗话》专门指出“滑稽诗别具一格,……欲一语解颐,用近体诗为佳”^③。王无为则对滑稽诗话创作的不良现象专门进行了批判。滑稽诗话作者群体面对滑稽诗话的不同态度与矛盾心态,也是当时人们对待流行文化、通俗文化的正常反应。

三、形态特征

与其他诗话不同,滑稽诗话不仅诗料来源多样,编排体式不一,其行文语言、打造艺术与文风也独具特色。其一,滑稽诗话录诗的来源多样。来源之一是抄录前代笔记,形成了“汇辑型”。如刘曼云《幽默诗话》抄录宋人马令《南唐书》中彭利用掉书袋之事;曹绣君《滑稽诗话》中“驼峰之戏”诗录自明人叶盛《水东日记》;“粪桶退敌诗”录自清人朱克敬《雨窗消意录》;纪象庭自嘲诗则抄自清人梁绍壬《两般秋雨盒随笔》等。曹绣君所汇辑的《喁喁诗话》更是对历代滑稽诗作本事与故事的汇萃。此诗话先后从史书、笔记(如《启颜录》《云溪友议》《群居解颐》)、诗话(如《本事诗》《全唐诗话》)等文献中汇出与滑稽相关的诗作、诗话达300余则。胡山源《幽默诗话(全一册)》中所有材料也均采自各种诗词曲联话和古今各种笔记。再一类则源自时人或者朋友创作。如嘯堪《说诗解颐》录高邮谈人格诗数则;郑逸梅《滑稽诗话》录友人陶孝初之父效仿王渔洋诗作;王翁曼《狂浪堂诗话》专录朋辈戏谑之诗。另一类是编者搜集民间的搞笑诗歌、民谣、打油诗等形成滑稽诗话。如闻见《游戏诗话》主要选取当时的民间谐诗,蛰庐《滑稽诗话》(载于《立言画刊》,1939年第50期)录民间竹枝词16首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还有不少滑稽诗话是由编写者自己创作的。如卞良选《游戏诗话》、樗癭《滑稽诗话》、臞蟺《说诗解颐》、燕子《滑稽诗话》等。当然,很多滑稽诗话所录诗话来源并不是单一的,

^①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17年,第175页。

^②松庐:《五十年后的文艺界》,《社会之花》第1卷第2期。

^③张恨水:《滑稽诗话》,《益世报(天津)》1921年1月22日。

既有汇编前人、时人所作,也有取自友人、民间所作。如王兆霖《挹翠室滑稽诗话》既选录有明人郎瑛《七修类稿》中“月中桂诗”、清人徐灵胎“嘲学究俳歌”,又选录时人所作“咏新嫁娘诗”等。同时,还选录有民间搞笑诗和友人所做滑稽诗。

其二,滑稽诗话的编排方式多样。报纸类滑稽诗话体例大都短小,随录随登。通常每篇由一则、两则或数则连缀而成,各则条目之间的排列并无固定和必然的逻辑联系,类似于《六一诗话》之体例,且呈“补白”“抄撮”状。期刊类滑稽诗话则比报纸类的编排显得更有系统、其体例相对清楚。如一明《滑稽诗话》所录每则诗话前均有标题,如“即景诗”“场中诗”“嘲村姑村媪诗”等,诗话照此排列,清晰明白。而著作类滑稽诗话体例各有不同。有的无规范体例,仅把诗话进行一则则汇编,全书无目无序。如范左青《古今滑稽诗话》即是随意罗列古今滑稽诗话的材料,杂乱无章。与此相反,有的则按照一定的体系和原则进行编排,如胡山源《幽默诗话(全一册)》。全书按题材内容进行分类,分为“文字”“天时”“夫妇”“幻异”“生死”等28种。曹绣君所汇编《喁喁诗话》也是如此,按滑稽诗话出现的时代(自六朝至清季)先后编排。这表明滑稽诗话作者已经有目的、有意识对滑稽诗话进行系统整理和考察。总之,与其他诗话相比,大多滑稽诗话论说部分缺乏,以抄录滑稽诗为主,“论”的成分较少,以“可供一笑”“谑而虐”“谑而不虐”等语作结,可以说是滑稽诗选或诗汇。

其三,滑稽诗话于行文语言、打造艺术、文风方面也独具特色。一方面,滑稽诗话的语言多文白夹杂,浅俗明白。文白夹杂既是滑稽体性(明白易懂)的要求,又是诗话体性(传统诗歌的文言表达与古雅形态)的必需。如筱峰《滑稽诗话》、常《荒唐诗话》等既有白话的“做客”“有人”“事实”“于是”“我的”等语汇,又夹杂着“曰”“亦”“者”这样的文言词汇。还有一些滑稽诗话或由浅俗白话的“诗”与文言表述的“话”构成,或由文雅的“诗”与白话的“话”组成,其反差也造成了滑稽效果。如纳翁《半痴斋诗话》选录的滑稽诗有“老僧带你西天去,免受人间杀一刀”句、汪逸庵《皓皓轩揅墨》嘲选举议员“凭君三寸生花舌,奈我金钱势力何”等语,而表述时带有文言语汇。另一方面,在打造滑稽效果的艺术手段方面,滑稽诗话主要通过汇集多种样式的滑稽诗歌达到目的。或选录语言粗俗的滑稽诗(如皓英《解嘲诗话》、尧《滑稽诗话》等);或选录内容新鲜怪异的滑稽诗(如发僧《滑稽诗话》录打包诗、川《乞丐诗话》录乞丐诗等);或选录体裁独特怪异的诗,如笑匠《滑稽诗话》选录17字、谭经《滑稽诗话》选录16字“吊脚诗”,澄醒《胡卢阁诗话·宝塔诗》用“宝塔”体,碧梧《谐诗话》选录“病诗”体(如以“顽”字为题作七绝,全诗11个顽字)。另外,还有的滑稽诗话选录创作方式独特的诗作。如承明《道龠谐诗话》录改写唐诗而成的“嘲惧内”;《樊山滑稽诗文集》录戏谑追和古人诗作(《和明人绣鞋诗》《和宝生青楼纪异四首》);高天栖《滑稽诗话》录步韵诗作(步王渔洋《秋柳诗》韵作《咏鬼诗》)。再一方面,滑稽诗话的文风与其他诗话有着迥然不同之处。其他类型的诗话风格大都雅正,而滑稽诗话风格以俗谑为主。这种以俗为美的风格,适合大众口味,既是娱乐休闲的结果,也是滑稽诗话自身体性的反映。与前代压抑通俗文化的生态不同,民国时期人们对通俗文化与文学的态度有了转变。正如有学者说滑稽诗话的产生“不仅丰富了诗话的内容,也对诗学艺术和文风的转变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①。可以说,民国时期俗文化与雅文化呈共生、共荣的态势。这样,“滑稽”的文风就影响到各种文体的创作。可以说,滑稽诗话是对传统诗话的丰富,其文风也是被压抑的“谐谑”美学“大爆发”的反映。

四、题材特征

滑稽诗话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不仅有休闲解颐、警世觉民之作用,还具有增长读者知识之功能。

^①李德强:《近代报刊诗话的娱乐性新变》,《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一方面,滑稽诗话几乎囊括了传统诗话的各种题材,反映面也更宽广。不少滑稽诗话与其说是诗学批评文献,不如说是滑稽诗歌的汇集。作为滑稽诗歌集,它们涉及了时政、社会、生活、教育、艳情、新游仙等多种题材,反映的内容与前代诗话相比,也更加丰富、更具时代感。时政类者,如吴双热《滑稽诗话》嘲讽了选举议员;芙影室主《滑稽诗话》涉及罢课罢市风潮;闻见《游戏诗话》对腐败官场、民国议会、清末科举等丑恶现象进行讽刺。这类题材内容在民初和二十年代相对较多。社会生活类可谓包罗万象。如范海容《滑稽诗话》嘲讽好修饰之男子;隳蜃《说诗解颐》(载于《晶报》,1922年1月12日)讽某人仿白话诗;啸堪《说诗解颐》(载于《时报》,1916年10月9日)录打麻将诗八首嘲其事。其他还有蛰庐《滑稽诗话》(载于《立言画刊》,1939年第49期)反映物价飞升。而黄晦园《滑稽诗话》借之描摹狎妓、鸦片、缠脚等沪上诸多现象。还有些滑稽诗话以嘲秃头、驼翁、车夫、妓女、秃子、缺嘴、骗子等社会底层小人物以满足时人低俗情趣。艳情类的滑稽诗话,如珍郎《诙谐诗话》嘲富人一妻一妾,可称绝妙。隳蜃《说诗解颐》(载于《晶报》,1921年11月21日)讽民初某部总长夜宿名伶之事。教育类滑稽诗话,如东塾《滑稽诗话》讽不孝儿,“读之令人堕泪。可以教孝矣”。^①另外,史别抱辑录新游仙诗十二首“电灯”“汽车”“气球”“留声机”等新事物入其《游戏诗话》。范左青《古今滑稽诗话》还涉及“洋衣”“自由”“民主”等外来事物和观念。通常滑稽诗话以旧体诗为主,但有时也收有新诗内容。如胡洵道《幽默的诗话》选录作品既有旧体诗,发出“孰谓旧体不如新诗哉”的反问,也有新诗,如《名流与政客》《苍蝇》等。这说明新诗在一定程度上被传统文人认同和接受。可以说,同民国时期其他诗话一样,滑稽诗话不仅包罗万象,更能谈传统诗话所不谈、更能言前所未有之内容。

另一方面,与传统诗话不同,滑稽诗话以滑稽方式达到休闲解颐的同时,还具有警世觉民、增长知识等功能。当时不少滑稽诗话如南熏《诙谐诗话》、诵之《王郎诗话》、小老虎《滑稽诗话》等追求的功能只有一个——休闲解颐、博人一笑。如蛟门乐天真《滑稽诗话》说录诗目的“志在传笑,别无他意也”^②。郑逸梅《滑稽诗话》更是认为:“夫歇后诗打油诗,大抵主文谲谏者为多,后之滑稽诗,半由此出,沿及末流,但引人笑,解人颐,不必皆存讽世之心。”^③与此不同,还有一类诗话则追求警世觉民之功能。有学者说:“小报文人以幽默、讽刺、滑稽的文学手法,对于官府的批判旨在‘隐寓劝惩’,以嬉笑怒骂的笔调给世人以警示。”^④此类滑稽诗话作者正是有着这样清醒的理念,如雪园《滑稽诗话》曰:“滑稽诗虽为游戏之作,顾主文谲谏,亦具箴砭薄俗之微意。”^⑤蒋箸超在《蔽庐非诗话》中就说:“余著‘非诗话’,有一极纯正之宗旨,不可不为阅者告者,则借诙谐以警世是也。”^⑥故蒋氏录诗只选关乎世道者。由此可知,这类滑稽诗话背后的严肃人文思考,所期望达到的,实际是传统诗学“刺政”传统的延续。正如有学者说:“滑稽诗话在嬉笑怒骂中对社会对人生的嘲讽、批判,这种强烈的人世情怀仍显示出了民国旧体诗话作家在主体上已经初具现代公民意识,已经荷负起现代社会的批判责任,从而使得民国旧体诗话相对于此前的旧体诗话而言,显示出了可贵的现代性思想质素。”^⑦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类滑稽诗话将知识与滑稽结合,使读者在愉悦之中增识开智。《消闲报》发刊词《释〈消闲报〉命名之义》一文说“童子读史传不得其门者,谈《聊斋志异》乃足启其聪明,读毛诗不知其义者,诵元人曲本乃适以开其智穷”^⑧。可见其认为消闲文学有“启其聪明、开其智穷”之功能。如吴夏

①东塾:《滑稽诗话》,《申报·自由谈》1913年4月23日。

②蛟门乐天真:《滑稽诗话》,《大世界》1919年7月14日。

③郑逸梅:《徐兴:滑稽诗话》,《游戏世界》1921年第3期,第8页。

④洪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287页。

⑤雪园:《滑稽诗话》,《大世界》1919年7月9日。

⑥蒋箸超:《蔽庐非诗话》(第二卷),民权出版社,民国四年(1915年),第13页。

⑦彭继媛:《试论民国旧体诗话的入世情怀》,《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⑧《释〈消闲报〉命名之义》,《消闲报》1897年11月25日,第2号。

伯《旧诗趣话》将旧诗重新以风趣言语来解说,使其焕发了“生机”。范左青《古今滑稽诗话》选录了一则将陶渊明《桃花源记》改编为滑稽诗对话体的诗话,旧内容融入新文体新文风,使读者得到新的知识享受。断霞《谐诗话》录清人梁山舟“反游仙诗”,评其“具唤醒痴愚、破除迷信之功”^①,又录徐花农书诗之引言,评其“独开新解,理有可据”^②。由此可见,滑稽诗话将文史知识“游戏”“谐趣”化,具有寓教于乐的意味。

五、诗学意义

以上对滑稽诗话特征的揭示可见,它们的确表现出了异于前代的风貌。曹辛华教授在《论全国国诗话的编纂及其意义》中指出,民国诗话的整理研究具有的重大意义。而滑稽诗话作为民国诗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整理与研究亦包含其中,其意义也不可小觑。就文学史、诗史、诗学史等方面来论,滑稽诗话有利于考察当时通俗文学的发展生态、探究新旧文学的冲突与调和,有利于我们从诗学观念、诗学理论和诗学批评的角度,构建滑稽诗学史、滑稽诗史。

其一,滑稽诗话对我们考察民国报刊的文化生态有一定助益,也有利于对当时通俗文学之发展状态的研究。汤哲声教授认为“在通俗文学中,滑稽文学尽管不是波澜壮阔,却也是连绵不断”^③。滑稽诗话是民国滑稽文学之类别,存在于民国时期各个年代,其状况的确是连绵不断。因此,对滑稽诗话的考察,有利于我们侧面了解民国报刊的文化生态。清末民初,滑稽文学开始兴盛。1897年李伯元率先在上海创办《游戏报》,“虽滑稽玩世之文,而识者咸推重之”。^④娱乐游戏小报渐渐风靡全国,进入20年代,小报数量更是剧增,竞争愈发激烈。尚俗、尚趣的滑稽诗话便成为小报创办者眼中的刚需,这类稿件甚至供不应求。如1919年6月《大世界》连续十几期刊登郁波罗馆主广征滑稽诗话的广告。文艺小报的经济效益引起了大报同仁的羡慕,大报也纷纷开辟副刊增加娱乐元素来吸引读者,从而增加利润。滑稽诗话很为阅者所爱读,甚至有人忍不住在报纸上“劝君暂辍烟霞好,才笔更展生花妙。一朝遍布广衢间,行路闻之皆大笑”^⑤,呼唤作者继续发表滑稽诗话。从考察民国报刊对于滑稽诗话的态度,可知其为了生存发展,对娱乐文学的强烈需求。滑稽诗话既属于娱乐文学,又是话体文学批评之类别,同时属于通俗文学之一种,自然于通俗文学研究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但当前人们在研究近现代通俗文学、通俗文化时,往往忽略了滑稽诗话这种介于文学文本与批评文本之间的样式,多将其当作批评文献,对其通俗文学的认知与重视不够。实际上,“滑稽诗话”的归属当如“笑话”“幽默”之类的通俗文艺行列,可以称之为“诗笑话”。因此,如果要考察各种通俗文艺样式的原生态,民国时期出现的大量滑稽诗话是不可或缺的。

其二,滑稽诗话是新旧文学冲突与调和现象的反映。由此可以考察,旧体文学在新文学逐渐占据中心地位的挤压下如何被迫向俗、向趣靠拢来争夺一席之地,新文学又是如何汲取旧文学之长。随着诗界革命和新文学运动的展开,不少人致力于将白话当作文学写作的主流。胡适说:“文学革命的作战方略,简单说来,只有用白话作文作诗一条是基本的。”^⑥旧体文学在这样的氛围下,举步维艰。旧体通俗小说作为新文学的对立面受到批判,称其为“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

①断霞:《谐诗话》,《益世报(天津版)》1928年6月7日。

②断霞:《谐诗话》。

③范柏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 下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0页。

④周桂笙:《新庵笔记》,转引自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2页。

⑤林屋:《索说诗解颐歌》,《晶报》1922年10月6日。

⑥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58页。

念”^①。旧体诗也在尴尬中生存,尤其在1917—1927年间备受冷落,被大多数人视为腐朽的骸骨。陈衍《近代诗钞》序哀叹“身丁变雅变风,以迨于将废将亡”,吴宓亦在《空轩诗话》中感叹“爱国革新之文化运动,已使文言书少人读,旧体诗几于无人作”。^②旧诗为了适应形势,为了争夺读者,向俗趣风格定位。再加上胡适认为打油诗——“就是文人用诙谐的口吻互相嘲戏的诗”^③,具有“训练作白话诗的大功用”^④,旧体诗更是向有趣、浅俗的风格发展。传统诗话有随兴而谈的特点,可吸引读者阅读甚至作诗的兴趣。正如G.L.在《新诗与新诗话》说:“细查旧诗入人甚深于原因,诗话之力也是不少!……而读诗话的,也就因此得引起作诗的兴趣,……我们既是要谋新诗的发展,那么,我们也须要注意诗话上的努力。”^⑤新诗人注意到了诗话对于诗的发展的推动作用。而这一点,滑稽诗话的作者也早有意识,为了更吸引读者,他们采用诗话的形式收录评论滑稽诗。滑稽诗话既保留了传统诗话的旧形式,又有着吸引读者的新内容,是文白相兼、旧中带新、俗中有趣。它既是传统文人恋旧情感的诗学再现,也是时代转折中旧诗在与新文学的竞争中性理的体现。而林语堂想借幽默“使传统文化摆脱宋明理学的教条与束缚,让中国文学与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型”^⑥的努力,也许受滑稽诗话“警世觉民、启人心智、具备现代质素”等优点的启示,故而引入西方“幽默文学”。林氏等人在上海创办《论语》半月刊,“以提倡幽默为目标,而杂以谐谑”^⑦的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作为新名词的“幽默”与谐谑成分更重的“滑稽”之间的联动。当然,幽默文学的提倡也在客观上激发了幽默诗话的创作。这种现象也可看作新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借鉴。以前人们探究新旧文学相互关系时,多从双方论争入手。现在从滑稽诗话及其相关现象来论,可更加清晰地看到旧文学与新文学之间的互动。

其三,民国时期滑稽诗话突破了传统“谑而不虐”的诗学观念,形成“诗贵趣可戏”的主张,丰富传统诗学理论的同时,对滑稽诗学与理论的研究也有重要作用。一方面,滑稽诗话能突破传统“谑而不虐”的诗学思想,形成了异于传统的“滑稽”诗学观念,是对传统诗学的开拓。我国诗教的传统观念主“温柔敦厚”,于滑稽文学观念也主张嘲讽有度,不可过分。当时人们虽然也知“谑而且虐”不妥,如王兆霖在《挹翠室滑稽诗话》指出“滑稽诗太过则近俗,不及则寡趣”^⑧。但要达到俗、趣中和,与传统相继,又与此时盛行“滑稽”之风难抗衡。因此,民国滑稽诗话有不少作者打破了“中和适度”“谑而不虐”的传统审美追求。如岂常《幽默诗话》云:“片言解颐,则亦颇非易易,至如‘谑而虐’者,既须顾全事实,又要明讽暗喻,自觉尤为甚难。”^⑨他不仅在理论上认同“谑而且虐”,在实践创作上,也践行着这一理念。如其录学生违反师命去登高一则诗话中,评先生、学生互相作诗为“谑而且虐矣”^⑩。类似的评论还有很多,尤其以嘲弄身体、行为、品性的“丑怪”“错误”为内容的滑稽诗话,大都谐谑成虐。亚理斯多德(Aristotle)认为,“喜剧是对于比较坏的人的摹仿,然而,‘坏’不是指一切恶而言,而是指丑而言,其中一种是滑稽。滑稽的事物是某种错误或丑陋,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⑪诗话作者对这些丑的叙述,以一种丑怪美学的书写方式,突破了“教化”“抒情”的范畴,拓展了传统“趣”的范畴,使得“俗趣”像“雅趣”“理趣”一样,为当时诗歌、诗学开创了新境界。正如岩岩《还自笑庐滑稽诗话》

①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萃》,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年,第36—37页。

②胡迎建:《民国旧体诗史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③胡适:《白话文学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71页。

④胡适:《白话文学史》,第172页。

⑤G.L.:《新诗与新诗话》,《孤吟》1923年第3期。

⑥钱锁桥:《林语堂传 中国文化重生之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2页。

⑦林语堂、张跃铭:《林语堂隽语》,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283页。

⑧王兆霖:《挹翠室滑稽诗话》,《社会之花》1924年第1期。

⑨岂常:《幽默诗话》,《福尔摩斯》1934年9月12日。

⑩岂常:《幽默诗话》。

⑪亚理斯多德:《亚理斯多德诗学 修辞学》,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3页。

曰：“诗以言志，而近人每喜以滑稽出之，亦东方曼倩之遗意也。余不善诗，而好阅此种诗。将所得所忆者录之，以博阅者一粲，亦可为诗界别开一生面也。”^①基于此，“诗歌是否滑稽有趣”成为又一批评准则。如心父《谐诗话》曰：“俳体之诗，贵有风趣，而又须不涉淫佻；韵律稍差，尚无大碍”^②。而周瘦鹃在《游戏诗话》中，对游仙诗进行了理论总结。他认为：“近人多作游仙诗。翻新花样，的的可诵。虽非诗之正格，亦可谓游戏三昧。”^③这就补充了传统诗学批评理论。诗“贵趣可戏”的理念，诗可以为“笑”而“笑”的诗学思想，不仅丰富了传统诗歌理论，还显示出诗话具有的“现代”意味。有学人认为：“笑声本身蕴含着颠覆性，它代表着对规则的蔑视，没有什么是不能冒犯的。这本身其实也是一种现代精神。”^④如果说现代精神是一种勇于改变规则、敢于颠覆传统的话，那么滑稽诗话敢于脱离雅正的面孔，把诗歌这种高雅的艺术变得通俗有趣，并高举以滑稽有趣为标准的诗歌批评准则，就应该算得上具有现代精神了。因此，我们认为，滑稽诗话以其编写的大量作品及相关论述，于传统的言志（教化）、言情（抒情）两种诗学外，为我们构建抒写趣味（滑稽）诗学提供了史料库。同时，也启示我们当考察民国诗学中“滑稽”范畴。

其四，民国时期滑稽诗话为我们构建滑稽诗史提供了大量史料，也是抒写滑稽诗学史不可缺少的史实。一方面，虽然滑稽诗的历史源远流长，但由于受到正统诗学观念之影响，此类诗并不被重视，难以登上大雅之堂。刘勰虽把“谐隐”作为一种文体的存在，系统论说谐隐类文章，但认为“本体不雅，其流易弊”^⑤。刘勰之后，对谐谑诗仍旧轻视，更没有专门的诗话出现。民国滑稽诗话集中保存了大量的滑稽诗，这些诗种类多，数量大，内容不仅丰富，而且来源广泛，既有唐宋人物事迹、明清笔记杂谈，也有时人时作。这既可视作对滑稽诗史的初步梳理，也为我们整理滑稽诗史提供了借鉴。诗话收录的滑稽诗的题材、体裁和创作方式多样，其作者的诗学观念和实践已突破“谑而不谑”的传统思想，诗学批评有了新的视角，这些都有助于滑稽诗史的构建。随着当代对通俗文学观念的改善，其深入研究和系统整理的条件已经成熟，滑稽诗史的研究自然离不开滑稽诗话文献。另一方面，滑稽诗话“以诗存事”“以诗存史”的观念，还为我们书写滑稽诗史提供了参照。民国时期的作者事实上也有明确意识。如瞿蛩《说诗解颐》云：“材料之汇集殊非易易，漫以市井无谓之谐谑，滥竽充数纵可博浅者一笑，终不免为大雅所嗤，故宁缺毋滥云尔。……予于丙辰丁巳间，闭门索居。两年中之人事，穷奇极怪，以小诗纪之，凡三数十首，题曰‘滑稽诗史’。……顾亦有其人其事，可留备野史之采择者，则吾诗亦不妨与俱存。”^⑥由这些“以诗存事”“以诗存史”的滑稽诗话，我们还可窥见当时滑稽诗创作的心理。滑稽是对负面情绪压制的释放，即刘勰所说的“内怨为俳”。晚清垮台、科举取消，大批传统文人失去入仕途径，价值观念无所适从，种种负面情绪需要宣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就认为幽默“具有某种释放性的东西”^⑦。赵苕狂《滑稽世界·序》所谓“把锋芒藏在曲折和隐晦之中，把家事国事混杂在游戏消闲之余”^⑧，也诠释了滑稽诗话创作的心理与态度。这也要求我们在建构滑稽诗史、诗学史时，必须深挖其背后的心灵意识。

（责任编辑：蒋永华）

①岩岩：《还自笑庐滑稽诗话》，《快活世界》1914年第2期。

②心父：《谐诗话》，《越南春秋》1934年第36期。

③周瘦鹃：《游戏诗话》，《先施乐园日报》1918年12月15日。

④维舟：《笑声的现代性：1940年代孤岛上海的滑稽与反讽》，《第一财经日报》2019年10月18日。

⑤刘勰：《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0页。

⑥瞿蛩：《说诗解颐》，《晶报》1922年10月12日。

⑦[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张唤民、陈伟奇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143页。

⑧赵苕狂：《滑稽世界·序》，《滑稽世界》1924年5月。

The Comic Poetry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Poetic Features and Significance

LI Feiyue, CAO Xinhu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re were a large number of comic poems, but there is a lack of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on such type of literary creation. This requires us to examine them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so as to promote the study on the old-style literature, poetry and poetics in that period. The comic poet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ot only had many names, diverse forms, and media, but also had different publishing conditions at different stages, showing a prosperous and complex picture of literary existence. The identity, competence, and creative mentality of their editors and authors were unique to such an extent that they were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generations of authors. In addition, the comic poetry not only had diverse sources of poetic materials, showing different linguistic, textual and editorial styles, but was also rich in content and themes. Poems of this type had the functions of providing entertainment, alerting the world and the people, and increasing readers' knowledge. The study of such poems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investigating the developmental ecology of the popular literature at that time, exploring the conflict and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old literature and the new literature, but also conducive to constructing a history of comic poetry and a history of comic poe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etic concepts, theory and criticism.

Keywords: comic poetry; features; poetic significance

About the authors: LI Feiyue is PhD Candidate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 CAO Xinhua, PhD in Literature,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